

中国与以色列友好关系论

刘辉¹, 曹华²

(1.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重庆邮电大学 英语系, 重庆 400065)

摘要: 中国人民和犹太人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这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 双方关系发展迅速。政治上, 高层互访不断, 经济上, 经贸合作广阔, 文化教育上的合作深入。对阿以冲突,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在新世纪, 中以友好交往前景广阔。

关键词: 中国; 以色列; 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6)01-0061-06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 两个拥有灿烂历史和悠久文化的民族, 两个为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民族, 两个饱经忧患的民族, 两个自强不息的民族, 直到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 21 世纪时, 两个民族才开始了国家间的文明交往。1992年 1月 24日, 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建交后, 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迅速, 出现骄人的成绩。

一、历史上的犹太人和中国人

中犹太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公元 135年, 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第五次起义失败后, 遭到残酷迫害, 开始了犹太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离散。从此犹太人开始了长达 1 800多年的流亡史。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 也有一部分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路来到中国, 他们在中国的新疆、宁夏、甘肃、开封、宁波、广州等地居住。由于受中国“学而优则仕”封建思想的影响及同中国各族的通婚, 加上与外界隔绝, 来到中国的犹太人逐渐被中国主体文化同化, 最典型的是开封犹太人。从对开封犹太人后裔的调查资料来看,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还存过的“七姓八家”, 现在只剩下“六姓”了, 他们早已没有犹太教信仰, 风俗习惯已几乎完全汉化。确切地说, 他们已是一些能记述其祖先是犹太人的汉人了。^[1]

当开封犹太人逐渐被中国主体文化同化时, 随

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 大量的塞法拉迪犹太人到中国经商, 其中有些成为犹太巨富, 如沙逊、哈同、嘉道理等。19世纪 80年代, 俄国及东欧等国的反犹狂潮又使几万名俄国犹太人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 随后南下上海。他们在当地组成社团, 建立犹太会堂。到 20 世纪 30年代, 上海犹太社团的人数已近 5 000多人, 他们拥有自己的社团协会、宗教公务、犹太会堂、学校、医院、养老院、公墓、商会、政治团体、报刊等。^[2]

1933—1941年, 纳粹德国疯狂残暴的反犹运动致使大约 3万名犹太难民来到上海, 他们受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及上海富有犹太人的救助而生存下来。中犹太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在德国排犹期间曾向申请入境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 2 000份签证, 从而给身处危境而又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以希望。何凤山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2000年, 他被以色列政府授为“义士”称号。1992年 12月下旬, 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访华时, 在杨尚昆主席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曾说: “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3]

这些定居在上海的犹太人同中国人民并肩作

战,积极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为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及新闻出版业做出了贡献。按照文明交往论的观点,交往不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互相学习,互相理解,消除冲突,弥合分歧的桥梁和纽带。对民族、地区和集团来讲也莫不如此。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以关系

中犹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为两国的正式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础。建国后,由于受冷战时期国际大环境的制约,我国外交以意识形态划线。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立了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1)另起炉灶;(2)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3)向苏联“一边倒”。^[4]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民主的桥头堡,以美特殊关系自然影响到中以关系的发展。虽然早在1950年1月10日,以色列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世界上承认北京政府的第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受国际环境及双方对外战略框架的制约,中国和以色列并没有顺利建交。在国际事务中,以色列大多追随美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色列支持美国。1954年第9届联合国大会表决美国关于暂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时,以色列投了赞成票。此后,以色列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及第三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更加深刻,中东问题更加严重。着眼于国际斗争全局和争取阿拉伯国家的需要,中国站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中国和以色列的交往更加减少,中国同以色列私商之间的一些小额贸易也完全停止。中以关系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5]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次年签署和平条约。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中国也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外交政策也作了重大调整。这一切为中以的正式建交铺平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同以色列开始了民间往来。198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会晤了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双方就中东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5]经过双方多次磋商,1990

年2月和6月,中以双方分别在特拉维夫和北京设民间常驻机构。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以建交,不仅标志两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6]中以建交后,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以色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和伟大的中国建交,我们对此十分赞赏”,“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从而有机会为两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共同工作”。^[7]

(一) 中以政治关系:往来频繁

中以建交后,高层互访不断,政治往来频繁。这为加强双方相互了解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色列前总统哈依姆·赫尔佐克,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前外长及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现任总统摩西·卡察夫,以色列财政、农业、贸易、旅游、教育文化和体育各部部长,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最高法院代表团,议会代表团及农业专家等均访问过中国。中国国家副总理邹家华,前外长钱其琛,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财政、农业、外贸部等各部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代表团,新华社代表团及中国国防广播电台代表团均访问过以色列。在高层互访中,两国签署了各项政府协议及合作协议。譬如,1995年,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在访问以色列时,中以签署了四项经贸合作协议,涉及电子通讯、医疗设备、食品加工及高新技术转化等。正如1997年12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以色列会见利维外长所说的:双方保持接触,经常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对增进了解扩大合作是十分有益的。^[8]以方也非常重视发展同中方的关系。1998年5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前夕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发展中以关系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关心的中心,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下,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本身已证明了中

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因此内阁决定全面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并把加强高科技、农业、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放在首位。^[9]

2000年4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在同以色列总统巴拉克会谈时,巴拉克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样有着巨大潜力。以色列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国家建设过程中,以色列愿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参加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我们两国人民完全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今后一定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在工业、农业、高科技等各个领域,以色列同中国进行合作的大门是完全敞开的。^[10]

政治上的频繁往来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二)中以经贸关系:蓬勃发展

中以间的政治往来推动了双方的经贸合作。自1992年以来,两国经贸发展迅速,合作良好,前景广阔。1992年,两国贸易额为5.147亿美元,到2002年,已达到14.2亿美元,增长近30倍。中以双方经贸合作的良好势头是由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广阔;以色列受国土限制,市场狭小,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大,但是以色列科学技术发达,尤其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尖端电子技术及农业技术上位居世界先进水平。然而,以色列不产石油和煤炭,原料和动力资源短缺,对轻工业产品、日用品、工艺品、丝绸、家用电器、一般医疗器械、医药和部分食品都有一定的需求。^[11]而我国在轻工业产品、日用品、纺织品、家用电器等方面具有优势。中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自然使两国经贸发展迅速。以1993年为例,以色列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占65.5%,化工产品占27.7%,钻石占6.8%;中国出口以色列的产品中,纺织品占70.7%,轻工业产品占10.6%,食品和农产品占9.8%,金融产品占8.9%。^[12]

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吸引着以色列商人来华投资。据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处提供的资料,截止

到1999年7月,已经有243家以色列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其中农业技术公司59家,数据通信和电信公司33家,电子元器件公司29家,软件公司21家,贸易公司23家。中国和以色列合作最大的项目是以色列联合发展公司在青海投资逾3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钾肥厂。^[11]

正如温家宝副总理2003年12月会见以色列总统时所说的,中以经贸合作有较强的互补性,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以色列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相信只要双方抓住机遇,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中以经贸合作就一定能达到更高的水平。^[13]

中以经贸合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合作。以色列土地贫瘠,60%以上土地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而且干旱少雨。但是,以色列农业是一部长期与恶劣自然环境作艰苦斗争和最大限度利用珍贵的水土资源的成功历史。以色列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设施栽培技术,在荒漠中创造了人间奇迹。我国农业要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色列农业有诸多借鉴之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地理环境和气候与以色列有诸多相似之处,以色列的贮水技术和电磁水技术值得研究和引进应用。有鉴于此,农业合作一直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重视。1993年,中以农业培训中心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成立。1995年,中以合作示范农场在北京通州区建成。1997年,双方正式成立“中以农业联合委员会”。2001年10月12-19日,以色列农业部长沙罗姆·希姆宏访华。农业部长杜青林与其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中国以色列农业合作会议纪要”。

中以合作另外一个较大的领域是劳务合作。以色列是个移民的国度,源源不断的移民使以色列建筑业对工人需求较大。由于对巴勒斯坦籍劳工的限制,这使以色列对外籍劳工需求较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及城市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以色列输出劳务,既可增加外汇,又可解决我国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自1992年,两国建交至1997年5月,中国27家公司向以派出劳务人数已接近5000人,年均汇回2500万美元外汇,成绩和效益总体令

人满意。^[14]然而,相对于以色列可以接纳 20 万外籍劳工的数量来说,中国向以色列的劳务输出仍有很大潜力。

另外,对于中国的广大投资者而言,以色列是中国产品通向世界的桥梁。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世界主要市场诸如美国、加拿大、欧洲联盟国家及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约国。^[15]这样,中国公司可以利用以色列通向世界市场这一桥梁作用将自己的产品推向世界,而不仅仅是把其作为最终市场。中以建交短短的十几年里,中以经贸关系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由两国的经济特点和状况决定的。开放是文明昌盛的标志,坚持开放始终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既能吸收先进文明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管理技能,也能外化自身的文明,形成文明间的互动。

(三)中以文化交流:互相学习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犹太人在公元 1 世纪大离散后流亡世界各地,但是他们凭着对犹太学的坚持和对上帝的信仰,纵然流散,仍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相对于中以政治经贸而言,双方的文化交流显得有些滞后。不过,这在中以两国的交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中方积极开展同以色列的文化交流。1993年,两国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此后,中国电影公司曾在以色列举办过电影展,1998年,双方签署了 1999-2001 年中以文化交流执行年计划。犹太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也倍受学界关注。目前,国内的上海、开封、南京、哈尔滨四地有专门的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 7月,代表当今世界犹太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以色列巴沙-伊兰大学授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哲学名誉博士学位,以肯定他在犹太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徐新教授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被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认为: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有助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间的进一步联系,为我们的传统和友好关系增添深度和含义。

中国文化也同样受到以色列人的重视。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中文在以色列成了许多人的热心追

求,以色列的一些大学纷纷设立中文系、东亚系和中国研究机构。近年来,以色列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中国的京剧团、杂技团、芭蕾舞团在以色列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

据悉,中以两国的教育交流主要在双方的大学之间进行。目前,大约有 100 名中国留学生在以色列学习,大部分为研究生,也有一些以色列学生在中国留学。1995年 3月,以色列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长阿姆农·鲁宾斯坦访华时,双方签订了教育合作备忘录,主要包括邀请以中两国教育合作问题的人员互访、考察,开展大学校长互访,加强大学的教育与科研交流。^[16]2000年,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和以色列教育部部长萨里德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以色列教育部教育合作协议》。

三、中国对阿以冲突的立场

阿以争端旷日持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以争端。我们主张,应以联合国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为基础,实现中东问题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应予以恢复;与此同时,所有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只有这样,中东地区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7]我国领导人在同阿以双方领导人会谈时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中国同以色列关系良好,也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中东和平进程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一贯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主张有关各方采取灵活、现实和积极的态度,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推动和平。

1997年 12月 23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议长蒂雄会晤时,钱其琛阐述了中国对中东和平的看法,即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他说:“我们认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符合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本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东问题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冲突,涉及各方的主权和领土利益。中东

问题公正、全面、持久的解决,需要各方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通过政治谈判来实现。中国将继续运用自己的影响,同中东各方保持接触,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力所能及的努力”。^[18]

2000年,巴以冲突重新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以积极的姿态推动冲突的解决。2001年6月7日,唐家璇外长分别打电话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及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两次通话中,唐家璇阐述中方立场,呼吁双方放弃武力和对抗,采取对话和谈判,并表示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自己的努力。

为在中东和谈中更积极地发挥作用,2002年9月,中国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家王世杰为中东特使。此后两年他四访中东,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积极努力。2002年11月6日至14日,他进行了任特使后的首次外交斡旋。王世杰在外交斡旋中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建设性意见,即中国反对一切伤及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动,以暴抑暴只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仇恨,增加互不信任,加大中东和平进程的阻力。希望双方停止暴力。^[19]

四、结束语

中国和以色列没有根本性的厉害冲突,中以合作领域广阔,前景喜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互利合作交流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在接见访华的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时表示,中国愿与以方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和互利互惠的友好合作关系。

2003年12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来华访问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时对发展中以关系提出四点建议:(1)继续保持两国高层接触与沟通,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与磋商;(2)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双边经贸合作;(3)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和促进民间交往;(4)着眼长远,扩大共识,共同推进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20]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四点建议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

从中以建交的历程来看,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片面的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反帝、反侵略的立场,这

延误了中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随着中国外交的渐趋成熟,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全方位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目标。再加上中东地区和平进程的启动,这使两国终于在1992年建交。中以建交后双方合作关系发展迅速,硕果累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现代交往,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开放性的全球性交往格局已经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的基本纽带之一。中国和以色列通过彼此之间的文明交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相互合作,共同促进彼此交往力和生产力的提高,实现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必将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做出各自的贡献。

然而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早已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过多的地区和国际因素牵涉其中,这使两国关系更加复杂。虽然中国和以色列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常常成为中以关系的掣肘性因素。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民主的桥头堡,以美特殊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为减少中国军力增长对台海安定造成的威胁,同时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实行对华的武器封锁。中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也因此受阻。2000年,以色列接下了中方四架Phalcon早期预警机的订单,总价为10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以色列被迫放弃订单。2005年,以色列和中国的武器销售合同同样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被以色列单方面取消。在美国看来,以色列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从来不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她总是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来限制以色列对华的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输出。这样,中国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于中国来讲,在纵横捭阖的国际斗争中谋求自身利益,需要采取主动,同时实行多边战略,打通多个渠道,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张綏.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

[2]潘光,王健.一千年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抵京,杨主席主持仪式宴会欢迎 [N].人民日报,1992-12-25(1).
- [4]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J].战略与管理,2002(4).
- [5]王泰丰.新中国外交五十年(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614-616
- [6]两国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以在京签署建交联合公报[N].人民日报,1992-01-25(4).
- [7]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希望以中关系在各个领域积极发展,需要假以时日解决阿以冲突 [N].人民日报,1992-04-08(6).
- [8]钱其琛同利维会谈[N].人民日报,1997-12-23(6).
- [9]以色列总理访华表示两国合作前景广阔[N].人民日报,1998-05-25(7).
- [10]江泽民主席与巴拉克总理会谈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不断拓展互利合作领域[N].人民日报,2000-04-14(1).
- [11]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93-189.
- [12]赵伟明.中以经济技术发展迅速(上)[J].国际展望,1997(4).
- [13]王莉.吴邦国,温家宝分别会见以色列总统[N].人民日报,2003-12-20
- [14]陈文林.一九九七年以色列劳务市场形势分析[J].国防经济合作,1997(10).
- [15]陈文林.以色列的合资合作市场[J].国际经济合作,1996(12).
- [16]以色列教育部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希望加强与中合作与交流[N].人民日报,1995-03-28(4).
- [17]社论:祝贺中国和以色列建交[N].人民日报,1992-01-25(4).
- [18]钱其琛与以色列议长会晤 会见以工党主席[N].人民日报,1997-12-25(6).
- [19]王世杰在中东做工作[N].世界新闻报,2002-11-18(1).
- [20]胡锦涛与以色列总统会谈[N].人民日报,2003-12-19(1).

O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LIU Hu¹, CAO Hua²,

(1.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glish,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The friendly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Jews have been very long, 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After China formerly established foreign relations with Israel, Sino-Israel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igh leaders have visited each other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been extensive,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very deep. When it comes to Arab-Israel conflict, China has maintained that Middle East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overallly, justly, and reasonab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prospect of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is extensive.

Key words China; Israel; relation